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贵州生态博物馆丛书

大山中的箐苗寨

胡朝相 主编

校

身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科技出版社



大山中的箐苗寨

校夏

胡朝相◎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科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山中的箐苗寨: 梭戛 / 胡朝相主编. — 贵阳:
贵州科技出版社, 2015.8

(贵州生态博物馆丛书)

ISBN 978-7-5532-0394-2

I. ①大… II. ①胡… III. ①苗族—乡村—概
况—六盘水市 IV. ①K92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0877号

大山中的箐苗寨: 梭戛

DASHANZHONG DE QINGMIAOZHAI: SUOGA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科技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 A 座 (邮政编码: 550081)
网 址	http://www.gzstph.com http://www.gzkj.com.cn
出 版 人	熊兴平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字 数	245 千字
印 张	11.75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 / 16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532-0394-2
定 价	38.00 元

天猫旗舰店: <http://gzkjcbbs.tmall.com>

前言

Foreword

一

梭戛苗族彝族回族乡¹是位于贵州省六枝特区西北部的一个行政乡，面积120平方公里²。按照生态博物馆文化社区区域面积即生态博物馆面积的概念，梭戛应该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从生态博物馆的视角来看，梭戛代表了一个以长角为头饰的“箐苗社区”，这个社区包括梭戛苗族彝族回族乡的安柱村（上、下）安柱寨，高兴村陇戛寨、补空寨、小坝田寨、高兴寨，新华乡的大湾新寨，双屯村的新发寨；还有五个村寨分布在与六枝特区毗邻的织金县阿弓镇境内，另有部分散居在其他村寨。计990多户人家4000余人。

梭戛位于海拔1400~2200米的高山之上。很早以前，这里曾是茂密的森林，由于过度砍伐，土地日益贫瘠，环境荒漠化严重，如今树木在这儿已经成了稀缺之物，仅在高兴村陇戛寨“祭树”的神山上还能看到一丝绿色，但也已找不到可供两人合抱的大树。

居住在箐苗社区的以长角为头饰的“箐苗”，俗

¹ 本书涉及的大量行政区域和行政单位，由于出现次数颇多，考虑到本书的文体性质以及所面对的读者群的阅读习惯，有时采用简称。

² 为尊重汉语使用习惯，便于少数民族阅读理解，本书部分单位使用非国际单位，如公里、里、亩、斤、尺、寸等。1公里=1千米=2里，1亩≈667平方米，1斤=0.5千克，1尺=10寸≈0.33米。

称“长角苗”。据老人们回忆，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奉命“剿水西”¹，水西人为了躲避战争，从战乱之地迁徙到织金、郎岱²交界的大山之中定居。由于交通闭塞，独具特色的“箐苗文化”便这样被世代传承，延续至今。

最具代表性的，是他们有别于贵州省境内其他苗族的头饰和服饰。之所以用“长角”作为头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民族学家认为，牛在当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畜力，备受箐苗人崇敬，所以，当地男子和妇女头戴木角是出于对牛的崇拜；二是有传说认为，箐苗先民生活在密林深处有野兽出没的地方，为了迷惑林中野兽，方头上戴角；第三种说法是，在战乱的逃匿中头戴木角是本族的一种标志，这样不论逃到什么地方，只要凭借木角，箐苗人都可找到自己的族群。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头饰已成为“箐苗人”最显著的象征。

箐苗人的音乐、舞蹈都颇具风格，用长竹筒制作的三眼箫吹奏出的曲调，低沉婉转，虽音域不宽，但犹如流淌着一首诉说不尽的悲歌。男子吹奏的木叶曲调，既没有其他苗族同胞吹奏的那份高亢和悠扬，也没有侗族大歌那如同蝉之音的仿声效果，却像是在凄婉地倾诉着心底的感情。听过的人们常说，这是箐苗人通过音乐来诉说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与痛苦。

箐苗人的重大节日活动，有正月初四至十四的“跳花坡”。这个节日就是一场民族歌舞与民族服饰的大展演，场面宏大自不用说，由于颇富吸引力，自然而然成为箐苗青年男女结交的重要节日。

箐苗信奉“多神教”。以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为例，寨里的箐苗每年农历三月都要开展“祭山”活动。除此之外，箐苗还有其他的祭祀活动。今日，这些活动都已成为箐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箐苗的手工艺有蜡染和刺绣。蜡染所用染料完全来自天然植物，是当之无愧的“原生态”，因此，箐苗寨子里几乎家家都有一口染缸。蜡染和刺绣，俨然成为寨里女人的人生“必修课”。在梭戛，每个女人都有一手绝活，但是却没有任何一本通用的“秘笈”，所有的技艺都只靠着祖辈们的口传心授。箐苗妇女们将她们的聪明才智全都倾注在了精美绝伦的蜡染和刺绣上，所以才有了这些箐苗文化的诱人瑰宝。

梭戛社区的民居建筑大致分为三大类：早期主要是木构架穿斗结构，屋面覆盖茅草；中期改为夯土墙，屋面仍然覆盖茅草；最后演变成了石墙草房，墙体均用石头砌筑，开间小，一般都用条石作挑檐枋，仍有人家只能用茅草覆盖屋面，但也不乏覆盖水泥瓦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已成为箐苗文化的一

¹ 地域上以鸭池河为界，鸭池河以西为水西，以东为水东。

² 今属六枝特区。

部活生生的“历史年鉴”。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向读者介绍梭戛生态博物馆那么简单，我们要讲述的是大山中的一个苗族分支过着的特别的生活，以及这份生活给他们、给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意义；同时，揭示梭戛生态博物馆产生的背景，以及在贵州省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重大意义。

二

生态博物馆是一个特殊的旅游景点，因为它既不是风景名胜区，也不是文物古迹之类的保护单位。就梭戛而言，它没有优美的山水风光，陪伴箐苗们的，唯有大山的荒疏

与苍凉。梭戛石漠化现象十分严重，植被覆盖率极低，且严重缺水；山寨里基本没有宽敞的楼房，不少是夯土墙茅草房。虽然有独特的以长角头饰为特征的箐苗文化，但其本身并不适合广大普通观光旅游者的口味，反而对游客的兴趣品味和知识储备有着严苛的要求，可谓真正的“深度”文化旅游地。从梭戛开馆十余年的接待情况来看，以国外专家学者居多，先后迎接了来自法国、挪威、英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客人，其中不乏人类学者、文化学者、民族学者、民俗学者、工艺美术学者，等等；国内的访客，情况亦差不多。有的学者来到梭戛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这纯粹是出于研究的需要。





染色

那么，梭戛生态博物馆的魅力究竟是什么？毋庸置疑，是鲜活的箐苗文化，是在大山中孕育出来的箐苗人的精神，以及箐苗人的审美艺术。这种艺术包括头饰、服饰、蜡染、刺绣、音乐、舞蹈，以及他们的民俗祭祀活动。这些活生生的箐苗文化呼吸在它最古老、最原始的生态环境之中，不是凝固的、静态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碎片，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可以参与的活的文化。生态博物馆的“陈列”没有分章节，没有逻辑关系的处理，它不是挂在墙上的一本教科书，而是最真实的长角苗生活本身。在生态博物馆社区里，远望有连绵起伏的群山，近观有炊烟缕缕的山寨；晚上可仰望满天的星空，白天能呼吸到清新无比的空气。山寨里，

处处飘扬着箐苗人动人的生产生活场面：蜡染刺绣的，纺纱织布的，舂碓推磨的，苗女们在一起梳头打扮的，男儿们聚着吹三眼箫的。他们的生活不仅是活着的文化，更是不断发展着的文化空间。这种活态的文化，需要人们去观察和体验，唯有这样，才能发掘出这些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文化的含义和价值，唯有与人发生联系并依据自己的知识进行界定和解释时，才可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展现；再精美的文化，如果其价值不被认可，将会永远被置于熟视无睹的境况——这就是为什么梭戛生态博物馆只能作为深度旅游之缘由，亦是本书写作之重点。

Contents

目录

1 生态博物馆结缘贵州 / 1

- “生态博物馆”概念第一次走进贵州 / 1
- 与苏东海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达成建立
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意向性意见 / 4
- 生态博物馆在贵州选点已成为现实 / 5

2 走进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 / 9

- 六枝至梭戛途中 / 9
-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第一次来到贵州 / 11
- 走进陇戛寨 / 13
- 对陇戛寨的考察 / 18
- 民居建筑 / 22
- 雷苗的长角头饰 / 24
- 寨老的家 / 27
- 走访鬼师 / 31
- 陇戛寨里的“小学” / 34
- 夜宿陇戛 / 36

3 课题组的考察成果 / 39

- 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 39
- 苏东海先生的学术报告 / 42
-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的学术报告 / 46

4 建馆前的准备 / 50

- 文件的产生 / 50
- 资料信息中心的选址 / 52
- 资料信息中心的建筑设计 / 55



Contents

目录

经费筹措 / 58

资料信息中心破土动工 / 61

陇戛寨的环境卫生调研 / 64

5 中挪两国元首出席梭戛生态博物馆
的签字仪式 / 68

6 挪威大使白山先生考察梭戛 / 69

7 开馆前的准备 / 74

8 隆重的开馆仪式 / 77

9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推迟下山 / 80

10 总结会 / 86

11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在梭戛的活动 / 91

陇戛的晚餐 / 91

小新寨之行 / 94

培训村民 / 100

12 面对一个旅游团的到来 / 103

13 达格先生到梭戛 / 106

14 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
在六枝举行 / 108

15 开馆后的困境 / 122

16 媒体的关注 / 125

17 省委书记的到来 / 128

18 梭戛生态博物馆现场会 / 132

19 学者来访 / 136

20 广西同行的到来 /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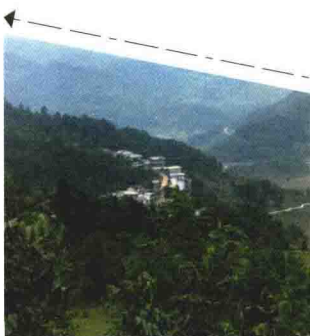
21 梭戛有棵“约翰·杰斯特龙
纪念树” / 144

22 中外学者云集梭戛 / 146

23 两位老人的对话 / 152

24 梭戛生态博物馆与《六枝原
则》 / 154

25 对梭戛生态博物馆的评价 / 159



生态博物馆 结缘贵州

“生态博物馆”概念第一次 走进贵州

自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问世之后，欧洲和南、北美洲迅速兴起了“生态博物馆热”，生态博物馆的现存数量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西欧有70座，集中于法国和西班牙；北欧有50座，集中于挪威、瑞典和丹麦；南美洲约90座，集中于墨西哥；北美洲约20座，集中于美国、加拿大和巴西；此外，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建立了不少生态博物馆。

可是，在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之前，整个亚洲还没有出现一座生态博物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态博物馆对于中国人而言，仍然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1995年，中国、挪威的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文博”）专家以“生态博物馆课题组”的形式，对梭戛社区的中心寨陇戛寨进行调查，认为“陇戛寨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仍然保存在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这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文化整体，尤其可贵的是，这支长角苗在全世界只有4000多人。因此，这个文化体已经成为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很

高的保存价值”。

这是“生态博物馆”这个概念和贵州第一次的碰撞，也是国内的博物馆专家们第一次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梭戛这个拥有独特魅力的文化社区。

到底什么是生态博物馆？这个首次进入中国的新兴博物馆理念究竟有着什么独特之处？

首先，生态博物馆不是自然保护区，生态博物馆是和人的生活发生直接联系的“社区博物馆”，又叫“社会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最早起源于法国，是法国博物馆学家对传统博物馆反思的结果。生态博物馆是人的生存环境和活态文化结合的产物，强调文化遗产不能从所在社区的使用者手中分离出去，而应原地保护。

其次，在生态博物馆社区内，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文化由居民自己保护，而不是由外来者保护。生态博物馆是联系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一条纽带，因此，生态博物馆是用发展的观点来保护和延续社区文化，是在历史的动态中保护文化。

第三，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理念是注重人和环境的关系，是环境学和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工业社会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和改善，但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空间。因此，生态博物馆对环境的保护，即是对文化的最好保护，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例如：梭戛社区的“箐苗文

化”是在该社区的生态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如果用传统博物馆的理念来保护梭戛社区文化，那么，环境保护不在其中，所谓“保护”，将沦为脱离环境的单纯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

所以，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它的文化社区涵盖着社区的山川地貌，文化则是置身于固有的自然环境之中。这里有大山和森林，有与人类同在一片蓝天下生

活的飞禽走兽、花鸟鱼虫。这些都是生态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生态博物馆除文化社区外，还必须拥有一个资料信息中心。资料信息中心是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象征和标志，没有资料信息中心的文化社区，就不能称为生态博物馆；反之，没有文化社区的资料中心，也不能称为生态博物馆，两者缺一不可。资料信息中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它既

跳花坡



是一个信息库、一个参观中心、一个研究中心，又是一个生态博物馆的办公场所和社会服务场所。它和传统博物馆的最大区别是不以实物收藏为目的，而是活态文化记录的信息库与社区居民的精神家园。

综上，生态博物馆和传统博物馆的区别在于：传统博物馆是一组公共建筑，建筑师为了博物馆的安全起见修筑了一道有形的围墙，所以它不是一个族群生活的社区。传统博物馆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博物馆工作者再将这些历史的碎片按照严密的逻辑关系组织成“教科书”式的展览。这些展览是静态的，是物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之相反，生态博物馆正是对传统博物馆反思的结果，它是一种理念，是自然和文化空间的结合体，而不是一栋将人类活动隔绝在外的有形的建筑体。它并不深奥难懂，即便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它，所以，一旦走进特定文化群体生活的社区，就等于走进了一座生态博物馆。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1998年10月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开馆，成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为中国博物馆领域增添了一个新型的博物馆门类。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来保护梭戛社区的“箐苗文化”，这就是梭戛生态博物馆存在的特殊意义。

新兴的博物馆拉开了中国博物馆建设的新篇章，但新鲜事物的传播总没有那么容易，生态博物馆概念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是同样的漫长并曲折。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生态博物馆的关注是从环境科学开始的。那时，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人与自然”的专题节目，大众开始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同时，由苏东海先生主编的《中国博物馆》杂志也刊登了有关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的论文和资料，其中就包含两位法国生态博物馆创始人乔治·亨利·里维埃和雨果·戴瓦兰的主要论文，文内详细记载了1972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学会“圆桌会议”，1984年加拿大的魁北克会议及其宣言，1987年在西班牙举行的新博物馆学会议，等等。从这些渠道可以了解国际生态博物馆发展的动态，但传播有限，并没有引起博物馆领域太多的关注，人们和社会所关注的仍然是以传统博物馆为主流的博物馆的发展新动向，中国也出现了建造大型博物馆的新趋势。在北京，扩建以后的国家博物馆成为国际上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同样的，20世纪80年代的贵州博物馆领域仍注重对传统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贵州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只是一张白纸，1986年前的贵州甚至连“生态博物馆”这个名词也不为人所知。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博物馆资深研究员苏东海先生应邀前来贵州进行文物考察，考察结束时做了一篇题为《国际博物馆发展新趋势以及我对贵州“七五”期间文化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的论证》的发言。

他说：“在法国，现在新兴一种生态博物馆，这与印第安人博物馆有所不同。它是对整体村落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进行的综合表现，它不仅表现过去，而且表现现在，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博物馆……建立生态博物馆也好，建立民族村寨博物馆也好，这是目前博物馆界中的一种尖端，如果贵州办这样一个博物馆，那就是全国第一。因此，我提个建议，贵州赶快派出考察组到法国、加拿大、日本、巴西等地实地考察，看看他们的博物馆是怎么搞的。”

这是“生态博物馆”这个概念第一次走进贵州。

与苏东海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达成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意向性意见

1995年2月9日，我刚从夏威夷考察回到北京，便利用在京停留的时间拜访了苏东海先生。

在夏威夷考察时我受到了很多启发。虽然夏威夷没有生态博物馆，但那里有民俗博物馆和“户外博物馆”式的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这些文化展示中心对夏威夷土著民族文化和环境的保护、利用都做得很成功，特别是在利用上突出了土著文化特色，由此带动了土著文化旅游经济的高回报率。

位于瓦胡岛上的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是土著文化再现的一个典型。该中心依山傍水，



与苏东海先生初次见面

笼罩在一片热带植物林中，人工湖将中心分为夏威夷、萨摩亚、斐济、汤加、塔西提、马克萨斯、毛利等七个村落，代表了玻利尼西亚七种不同的建筑文化。各村落建筑均保持几百年前的传统风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特色。它又是一个土著文化的展示和表演中心，凡到夏威夷群岛旅游的人几乎都要到这里来看表演。

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虽然没有冠以“户外博物馆”之名，却有“户外博物馆”之实。西方的博物馆专家认为这类户外博物馆是生态博物馆的前身，但它和生态博物馆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只是建筑的展示。虽然它也将这些传统建筑置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不是将其陈列在博物馆的一栋公共建筑之内，但它仍是一种静态的露天陈列，没有当地人的活动，没有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所以，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座活的博物馆。

相比之下，贵州的民族文化丝毫不逊色夏威夷的土著文化，甚而有过之而无不及。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等民族文

化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些民族文化的载体——民族村寨都置于真山真水之间：有的依山傍水，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情；有的在高山之上，形成了“白云生处有人家”的仙景……它们都是活着的文化。在去夏威夷之前，我得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料——六枝特区境内生活着一支以长角为头饰的梭夏苗族。资料是六枝特区文化馆馆长徐美陵送来的，资料中那些梭夏“长角苗”跳花坡的照片令人十分震撼。苗女们的长角头饰是贵州境内独有的，服饰也很别致，完全有别于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服饰。梭夏的苗族妇女服饰显得更朴素大方，百褶裙为黑底，镶有条花，上穿蜡染的前襟至腰间，后披至小腿的对襟上衣。图片中，整个跳花场被衣着盛装的苗女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些美丽的苗女犹如一朵朵盛开的鲜花，煞是动人。

由此，出国之前，我特地安排文物处的两位同志到梭夏做了一次调查，为建生态博物馆做前期准备。

我这次拜访苏东海先生的本意，是想以梭夏为试点建一座生态博物馆，但这还只是个想法，具体怎样建，没有一点头绪，只是鼓起勇气请求苏东海先生帮助贵州建立一座新型的博物馆。当时我并没说清楚是建生态博物馆，殊不知苏东海先生听完我的请求后，当即提出：“我们就先在贵州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吧。”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苏东海先生提议，邀请约翰·杰斯特龙先生作为贵州生态博物馆课题组的科学顾问。20世纪90年代，国内仅仅传播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动态，还没有任何一个省（区、市）有过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实践经验。而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是国际上颇有名望的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在挪威做了15年的生态博物馆馆长，欧美一些生态博物馆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借鉴他的实践经验。

之后，苏东海先生安排他的助手——《中国博物馆》杂志编辑部的安来顺先生，参与讨论在贵州建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方案。安来顺先生从南开大学博物馆学系毕业后，又在荷兰攻读了博士，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苏东海先生称他为中国博物馆界的年轻专家。

虽然这次我与苏东海先生仅交谈了两个小时，但是取得了在贵州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意向性意见。

临别时，苏东海先生说等他的电报回复。

生态博物馆在贵州选点已成为现实

回到贵阳后，我口头上向贵州省文化厅的领导做了汇报，厅领导认为，如果这件事办成，将为贵州文化对外合作立一大功。

1995年3月25日上午，苏东海先生从北京发来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1. 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接受邀请，将于1995年4月18日上午抵达北京。

2. 建立“贵州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调研组”（以下简称“课题组”），由四人组成，即苏东海、约翰·杰斯特龙、安来顺、胡朝相，苏东海先生任课题组组长。约翰·杰斯特龙先生既是国际博物馆学会委员，又是《挪威博物馆》主编，所以特聘为贵州生态博物馆的科学顾问。安来顺先生是国际博物馆委员会前主席冯·门施教授的学生，与欧洲博物馆学者有广泛的联系，所以由他担任翻译和协调人。而我则作为贵州方面的协调人。

3. 选择可供考察的地点，确定一处重点研究。与贵州文博界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提出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苏东海先生的电报虽然讲了三个内容，但最主要的还是确定考察点。选点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并不是简单地选择一个风景名胜区，而是要以生态博物馆理念为蓝本，从各方面衡量选点的契合度，才能最终选出综合实力最强的文化社区。

问题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确定考察点？贵州有17个世居民族12 000多个自然村寨，“全面撒网”是不可能的，只能选择重点。我们决定从民族村寨中着手选择，但并不是选择民族文化村，因为生态博物馆的选点和民族文化村有较大区别。两者相似的是，都强调民族文化而不是风景点；区别之处在于，生态博物馆不是单一的村寨，而

是一个文化社区，它涵盖的地域面积宽得多。这个文化社区有可能是一两个村寨，也有可能是更多的村寨，甚至可能是一座古城，更可能超出县界、省界乃至国界；只要是具有同一文化特点的地域区域，都有可能作为生态博物馆的选点。此外，选点不能过多地考虑交通条件，因为文化较为独特的村寨往往是交通条件最差的地方。通常在城镇附近或交通线附近的村寨，其“汉化”程度都较高，本民族的文化已失去了特色，故不在选点之列。

文化的含义和价值唯有与人发生联系时，才可以得到界定和解释。对生态博物馆的选点既是一种感性认识，又是一种理论探讨。挪威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达格先生在“中挪生态博物馆研讨班”做讲座时举了一个例子：在挪威北部已经进入北极圈的国土上，发现了一堆建筑材料垃圾。虽然是垃圾废料，但这堆建筑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在挪威的历史上曾经有人在这里建房的事实，说明这一带曾经有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壤和气候。正是这堆建筑垃圾的存在，使这里成为挪威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内亦是如此。1946年，在山西文水县牺牲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用过的半截铅笔，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因为鉴定者认为这不是一般人使用的铅笔，而是一个英勇就义于敌人铡刀下的年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使用过的铅笔。换言之，如果没有与人发生联系，这半截铅笔就一文不值。

以上例子强调人与文化的联系，强调对

文化价值的界定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

贵州境内民族村寨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但对其文化价值的认识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或许某一个村寨看过数十遍，但其文化价值仍然难以得到正确的界定。发现是对事物本体认识的一个过程，揭示出它的价

值，才是对事物本体认识的升华。

我根据个人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认识和见解，挑选了五个选点供课题组考察，即六枝梭戛、花溪镇山、榕江摆贝、锦屏隆里和黎平堂安。

梭戛是首选，在贵州苗族的若干分支中，它一枝独秀。语言、服饰、工艺、音乐、舞

刺绣图样



蹈等都不同于其他苗族文化，具有唯一性，而且只有 4000 余人，是苗族文化的瑰宝。

镇山的特殊意义在于，村寨坐落于省会城市贵阳的郊区，在城市现代化生活的包围之中，仍能保持布依族民族文化特色，尤为难能可贵。同时，它又是民族融合的一个典型。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江西庐陵县籍的将军李仁宇奉命入黔“平播”¹，后屯兵于石板哨一带，再后入赘镇山，与布依族女班氏结秦晋之好，婚后生两子，分别为班、李二姓，传至今日已有 17 代，村寨形成了布依族和汉族文化和谐共存的局面。

榕江摆贝苗寨，在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等方面区别于雷山、剑河、台江等地的苗族文化，在居住环境上也与其他苗族有所不同。摆贝苗寨坐落在高山上的一片枫树林里，寨子的民居全系木建筑，屋面多盖杉树皮。服饰上也颇有特色，不但妇女穿裙，男人也穿裙。这种裙子被称为“鸡毛裙”，纯手工制作而成，很是精美。

汉族文化的代表是锦屏隆里古城——一个明代的千户所。人们在理念上谈到民族文化时，往往忽略了汉族文化，但其实汉族也是一朵民族之花。隆里古城是明洪武初年（1368 年）明政权在贵州推行卫所制度²的历史见证。六百余年来，隆里人仍然固守着他们的汉文化，民俗学家称之为“飞地文化”。

黎平县报了两个村寨——堂安和兰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堂安较之兰寨更胜一筹。堂安地处黔、桂、湘三省（区）交界，是侗族南部方言区的中心地带，当地的居民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服饰、共同的生产生活习俗、共同的文化心理等，堂安侗寨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此外，堂安有很好的区位优势，从堂安到桂林只有 300 多公里，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说，前景可观，可将桂林的游客引至广西龙胜、三江，再到贵州黎平，形成一条侗族文化旅游线。

由于时间很紧，来不及实地考察，我仅用电话与相关地点的负责人联系，要求他们提供所涉地的图文资料于交通、食宿等基本情况。

1995 年 4 月 9 日，我再次到北京和苏东海先生见面。苏东海先生仔细看了我提供的以梭戛为蓝图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考察方案，很满意。

¹ 播州土酋杨应龙举兵反叛明廷，明廷调集六省兵力平定叛乱。

² 卫所制度又称“卫所制”，是明朝最主要的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隋唐时代的府兵制。